

王 政

“逆水行舟”的 10 年历程



王政,1982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外语系留校任教,1985年赴美留学,1987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史硕士学位,1995年获中国史博士学位,1996~1999在斯坦福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任研究员,

2000~2001 在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做博士后,2002 年至今在密西根大学任教,专业领域为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历史。

留学期间参与创立“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曾任学会联席主席),与国内学者合作开展推动中国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工作,争取了多个国际基金会的赞助,开展面向全国高校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师资培训班;主持翻译和编辑多种学术著述;主办了由密西根大学与中华女子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合作的首届中国妇女学研究生班(2002~2004);与复旦大学合作创办了社会性别学博士课程班(2006~2008);建立了密大-复旦社会性别研究所(任联席所长);组织举办了“百年中国女权思潮”国际研讨会(2005)、“首届社会性别学”国际研讨会(2009)和“华人女性与视觉再现”国际研讨会(2011)。

主要著作:《越界-跨文化女权实践》、《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合编:《社会性别研究选择》、《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百年中国女权思潮》、《女权主义在中国的翻译历程》等。

1999 年我应李小江老师约稿写了学术自传《心智的选择》^①,追溯了自己选择女权主义学术生涯的过程。这次谢玉娥老师约学术自传,那就借机回顾一下 1999 年以来的学术实践。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习惯于探究历史上的人物与她们所处时代的关系,也经常把自己放在具体的时空中进行剖析。回顾过去 10 年,我对不少事物认识的深化主要来自我作为行动者的实践和作为研究者的田野调查,而认识和思考变化的大背景则是国际国内的各种变化。

一头扎进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

1999 年初夏我携儿带女回到上海,打算用刚获得的研究经费在国内做半年田野调查和档案研究,为第二部英文专著搜集材料。回国前,我还争取到美国一个小基金会的一万美元赞助,用于天津师范大学与杜芳琴老师合办的一个暑期研讨班,与国内历史学者探讨如何将社会性别视角引进中国史和妇女史研究。这个史学研讨班是我和杜老师合作推动妇女学学科发展的第一个师资培训项目,而学科发展的具体行动设想则产生于 1998 年纪念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成立 10 周年的学术会议上。当时我们学会邀请了一批国内学者到波士顿参加会议,在此期间,我和杜老师商议了在中国开展妇女学学科建设的项目,并且与参加会议的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考伏曼女士沟通了推动学科发展的意图。准确地说,我们学会在 1989 年成立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推动妇女学在中国的发展,但当时国外基金会的资助热点是贫困地区发展项目而不是学科建设。所以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我们学会申请到不少资金参与国内的社会性别与发展项目,而推动女权主义学术的设想仅获得零星的小额赞助,仅靠着学会成员热情的义务劳动,出版了几本译文集。^②

1999 年福特基金会的赞助方针出现变化。这个变化并非单向来自基金会总部。大约在 1997 年末福特基金会开始进行社会性别评估,其驻北京

^① 《心智的选择》见李小江主编的《女性/主义?》,第 203 ~ 226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② 由海外中华妇女学会集体参与的译文集包括: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学术评介》,三联书店 1995 年版;谭竟嫦、杏春英主编:《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5 年版;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1998 年版;马元曦主编:《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办事处请了当时在联合国发展署工作的葛友俐和一位加拿大学者做评估人。葛友俐强调了中国妇女研究界对发展妇女学的呼声,论证了必要性和可行性,为基金会的赞助方针转向做了重要的铺垫。葛友俐和我于1997年我们学会与江苏社科院在南京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重逢时,我向她询问北京的各国际基金会资助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可能性,并与她讨论了妇女学学科在中国发展的前景。在我们后来的电子邮件联系中,她告诉我福特基金会的新动向,我则写了妇女学在中国发展的必要性的论证供她们纳入报告,意识到新的资金赞助机会可能出现,开始考虑相应的行动计划。波士顿会议正好使我有机会同关注学术发展的杜芳琴面商向福特基金会递交妇女学学科建设的项目申请。我们计划在多学科领域中开展面向全国的教师培训,推动高校课程改革并发展妇女学的课程和学位点。1999年夏天申请获得福特基金会批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新的首席代表华安德走马上任。“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不了解其他两把火点在哪儿了,但这一把火肯定是点在了赞助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上。华安德不仅热情支持我们的申请,还建议我们明确地把“社会性别学”与“妇女学”并列。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学术界的首席代表显然了解“社会性别学”在国际学界已是显学,其对象不仅是妇女,而是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一切人以及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鉴于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头十年申请学术项目的困难,我深知这个契机来之不易。“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我决定搁置自己的研究,全身心地投入学科建设项目中去。不过在向福特基金会递交的英文申请报告(在杜老师拟的中文稿基础上的改写)中,我并没有把自己列为项目申请人。其原因是:在波士顿会议上杜老师了解到我们学会其他会员也正在酝酿向福特基金会递交新的社会性别与发展项目申请,她担心如果我们同时递交学科建设项目,会在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内部造成竞争与不和,所以她回国后,对递交我们的申请迟疑不决。我弄明白她的担心后,当即提出了我认为是很简单的解决方案:这个项目不必作为与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合作的项目,不要写我的名字,仅以国内学者的名义申请即可,我不在乎名分,只要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就行。但是杜老师觉得不妥,若不作为项目申请人,如何认可我在这个项目中的策划和组织作用呢?她想出了“项目顾问”这个头衔,并郑重其事地与另两位项目申请人郑新蓉(教育学)和王金玲(社会学)一起向华安德提出对我的聘请。华安德对我留在国内搞项目将遇到的生计问题表示关切,提议让我申请一笔单独的小基金作为生活费。他略带歉意地说:“很抱歉我们不能按美国的工资标准来支付你,只好委屈你了。”他哪里知道我正为10年梦想终于成真而兴奋不已呢。

为什么我会如此痴迷于从事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的活动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市场经济时期社会性别话语和社会性别关系

的急剧变化使我产生了推动女权主义知识生产的紧迫感。自80年代以来,毛泽东时期的许多妇女解放成就被瓦解和抛弃,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规范、性别歧视的种种习俗、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在主流传媒中被乔装改扮为“现代化”的“开放性”新模式。当全球女权主义思潮和运动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深刻的社会性别文化的变革之际,中国的男性精英层却在否定20世纪初期的女权主义运动和以后中国革命历程中产生的社会性别文化改造成果,致力于恢复革命前的社会性别秩序。这个否定和复辟进行得如此迅速有效,以致到了90年代,不仅大批年轻妇女把自己的身体作为商品来交换,媒体更是普遍地把女人的身体作为卖点,甚至“女人是床上用的”这类公开宣称女人是性工具的说法都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刊物的封面上。在这场大变革中,中国的许多主流男性精英们一方面竭力鼓吹“与世界接轨”和将中国纳入“全球化”,一方面则无视国际社会推进阶级、社会性别、种族平等的大趋势,他们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各方面身体力行地巩固和扩大各种等级差异。对性别特权的追求成为后革命时期汉族男性精英阶级形成的重要构成内容,“妻妾成群”虽然还不到公开的程度,却已是界定“成功男性”的潜规则。在这场阶级和社会性别关系的大变动中,即使是精英妇女也在她们各自的领域中经常遭遇大男子主义的霸权,而日益边缘化的底层妇女则只能面对出卖廉价劳动力或出卖身体的“机遇”。

站在国门之外的我,清楚地看到一个危险的矛盾:迅速跃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前列的中国,其精英阶级的思想意识却同国际社会主流人文精神严重脱节。这好比一个用现代科技装备起来的四肢发达的巨人,却顶着一颗退化到前现代的小脑袋。改造这个脑袋,使这个脑袋健康发育,在我看来应是今日中国的当务之急。而一个“现代化”的健康大脑的基本内涵则离不开现代的平等公正之文化和理念。能否把妇女尤其是底层妇女作为平等的有尊严的人来对待是测试一个人是否具有现代公正理念的试金石。我无力去改变今日精英人士的思想意识,但我希望通过教育能使现代人文理念为明日中国主流社会所认同。在高等院校推进女权主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目的即在此。

其次,从80年代起,中国许多女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介入改革进程,积极地参与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维护妇女权益的方针政策法律的出台。在主流社会把市场的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理念奉为时尚的行为准则时,她们则坚守着对公正、平等、正义理念的追求,关注着边缘群体的权益和生存状况,由此产生了颇具规模的“妇女研究”运动。来自妇联系统、高校和社科院系统的女知识分子从各个学科背景出发开展了多样的妇女研究,关注点主要在寻求对当代妇女遭遇的问题的解决对策。以妇女为中心的学术建树也在同期出现,在邓颖超的支持下,全国妇联率先开拓了中国妇女运动史写

作,带动了史学界的中国妇女历史研究热潮。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则是从多学科背景出发对妇女的学术研究的开拓。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掀起了又一波妇女研究热潮。除了学术研究之外,一些高校女教师也尝试开设与妇女相关的课程。北京大学在郑必俊老师带领下,率先设置了妇女研究硕士点,为妇女研究进入高等教育做了开拓性的体制尝试。众多热衷于妇女研究的女学者是在中国推动妇女学学科建设的必要条件,她们已有的成就是继续推进的前提。

8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的“妇女研究”热潮曾是我的一项研究课题。在广泛搜集资料和访问参与者的基础上,我注意到至90年代末,妇女研究圈内对在高校内推进女权主义课程和学科的建设尚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协同努力。这个“缺乏”同国际基金会对学术赞助的冷漠密切相关。“妇女研究”在80年代出现时女学者的资源主要来自妇联系统,以后则更多地依赖于国际基金会的赞助。同我们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的经历一样,由于国际资助集中在社会性别与发展 and 反对家庭暴力等针对妇女现实问题的项目上,学界的不少女知识分子也就集中在这些方面申请资金开展活动。此外,在一些深切关注草根妇女生存状态的女权主义行动者看来,学科建设似乎太脱离底层妇女的实际,大有在象牙塔里坐而论道的嫌疑。

我对在高校开展学科建设的坚持来自两方面的认识。一、在理论方面,后结构主义理论对权力以及话语和主体性建构的关系的阐释对我影响深刻。知识就是权力,知识生产所体现出来的是权力关系。在男权中心社会里,若要想改变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等级关系,女权主义者必须改造知识生产领域,打破男权的话语霸权,颠覆男性中心文化对男女主体性的构造,具有平等公正理念的新型现代主体才可能产生。二、在实践方面,中美两国的现实对照为上述理论提供了有力验证。美国女权主义改造知识生产的努力渗透了高等教育,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在高校的创立为女权主义学术发展提供了体制基础,深刻地影响了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发展,成为改造美国主流文化的重要力量,提高了年轻人对以往熟视无睹天经地义的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认识觉悟,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坚持社会公正正义的一支对峙力量。而在中国的改革时期,社会主义的公正平等的理念和实践被抛弃的直接后果是各种等级差异的扩大,男性中心文化霸权的扩张和巩固,连高等教育界也盛行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男权主义和市场经济价值观。试想草根贫困农妇通过发展项目生活获得改善,含辛茹苦地把女儿送入大学,这个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女孩在今天的高校将有什么样的经历和处境?她所受到的教育对她本人、她的家庭和家乡的意义何在?如果中国女权主义者在当下历史关头放弃对高校这个重要的知识生产和传承领域的改造,成千上万的男大学生将继续被培养为与当代世界人文精神脱节的科技官僚

或市场弄潮儿(所谓成功精英人士),成千上万的女大学生则会被主流社会中的社会性别规范束缚而怯于施展自己的才华,也难以确立独立自主的主体身份。高校学生中流行多年的俗语“人分三种,男人、女人、女博士”就是当今男权话语对女学生规范的一个例子,而许多男女学生缺乏对这种明显的性别歧视语言和男权规范策略的警觉和抵制则更是今天中国高校亟待女权主义知识改造的反证。

中国的教育体制和内容需要变革,这大概是无可争议的议题。但在中国今日的体制框架中女权主义学术成为一种改革力量的可能性有多大,则是很可置疑的。既然我并不盲目乐观,却又毫不迟疑地为这一变革力量的出现投入时间与精力,如何解释这似乎是矛盾的选择呢?这就涉及第三个因素,即我本人的主体身份的构成。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们的成长背景型塑了我们的人生观。参与社会变革,消除人间苦难,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是个体生命获得意义的基本内容和前提条件。在中国女权主义行动者的行列中,我结识了许多具有相同的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女性;在海外我更是多年生活在各种女权主义群体中。与世界各地执著地追求理想境界的女权主义行动者为伍,自然巩固了我的信念和对自己人生选择的肯定。我非常敬佩的华裔社会活动家陈玉平,用《为变革而生》作为她的自传标题。这位在1940年就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知识女性的经历就是美国20世纪各种社会运动的个案历史,如今她还以95岁的高龄组织策划今年6月在底特律举行的全美国草根社会运动大规模集会——“美国社会论坛”。与黑人工人结婚、在底特律下层黑人居住区生活了近60年的陈玉平关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让社会更具人道精神(或曰“人性化”)?如何使个体的人性不断发展丰富走向更高的境界?她漫长的社会变革斗争曾有许多挫折和低谷,但她始终坚信:“我们可以靠我们的行动去改变现实。”美国从60年代依然存在着种族隔离到2008年选出黑人总统,可说是美国社会运动用公正平等理念改造社会文化现实的最有力证据。而在为社会正义和进步的不懈斗争中,陈玉平的人生和人性达到了绝大多数人不可企及的境界。我仰慕她这样的人生和人性境界。

实践出真知

如果从成立海外中华妇女学学会算起,我参与推动女权主义学术发展的活动有21年了。这些岁月自然充满艰辛和波折,但也有不少收获和喜悦,结识了一大批海内外志同道合者是我最大的收获。各种肤色、各种年

龄、不同性别和性倾向的朋友们的勇气、智慧、正义感、执著精神丰富了我的人生,开阔了我的视野,滋润了我的心田,坚定了我的信念。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物欲横流的今日世界我竟有缘结识了一批不懈地用行动去实现精神追求的“另类”,实属幸运。

对急剧变动的中国社会的认识加深是我的另一大收获。多年来我以“行动者/观察者”的双重身份在国内从事女权主义学术活动,在参与社会变革的活动中进行对变革者的研究。行动者的身份使我得以观察到局外人所无法知晓的内幕;观察者的身份使我能够跳出具体场景以“第三只眼睛”看自己和周围的人与事。内幕的复杂性与表象的单纯性之间的距离让我感悟到一般学术研究不可避免的局限:若不身临其境,学者对人物事件的描述往往仅能反映冰山一角,知其一二却难以把握在场景转移中动态变化的人际关系和事件的时空具体性,难以跨越台前幕后之间的鸿沟。这种感悟鞭策我自己在学术研究中要尽己所能地挖掘幕后故事,同时保持对研究者所具有的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即使身处幕后,我那“第三只眼睛”也仅仅是一个批判性分析的视角,而非全知全能的佛眼,总有许多我无法探及的奥秘啊!

写到这儿,我想起读美国史硕士学位期间,导师罗森教授曾告诉过我的故事。她是美国60年代女权运动的参与者,后来成为那代人中最早的美国妇女史学家。当年在美国女权运动中有许多冲突,许多当事人觉得是不可理喻的怪事。当时有些女权运动者曾表示过对联邦调查局对社会运动的渗透的警觉和担忧。几十年后,档案解密,罗森教授在做档案研究时竟看到了联邦调查局对她当年参加的一个小组的活动的详细秘密报告。我想求知的欲望会驱使我在将来中国档案解密时再回过头来对今天做历史研究。但那也可能是个无法实现的愿望,因为我至今都不能看到关于中国50~60年代妇女运动决策机构的档案。许多谜只好留给后人去破译了。

除了作为历史学者的感慨,作为身临其境的行动者,我还体验了一个正在进行的历史过程。具体分析起来,推动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的过程有多种阻力和困难。

一、在市场化大潮中,高校也成了一个大市场。不牟利不生利的女权主义学科建设在这样的大市场里显得格格不入。被包围在市场价值观和市场机制中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科建设直面了一个尖锐的谁改造谁的问题。

二、“妇女学”或“女性学”本身就是多种社会性别话语争夺的场域,既有女权主义改造传统学术抵制主流意识形态的开拓性工作,又有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上升的“女性味”话语的蔓延。后者往往以“现代性”的面具遮盖其陈腐的社会性别和阶级的等级价值观,又以“打造精英女性”的商标来吸引欲求攀登社会阶梯的青年女性。“女性味”话语是以市场

为媒介的,它以铺天盖地的势头占领了公共空间,包括众多高校讲台,强有力地建构着当代青年男女的社会性别观和女性的主体身份。

三、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禁区和高校的市场机制有效地缩减了批判性思维的空间,限制了批判性学术思潮的生发和交锋。即使是认同女权主义的学者也大多选择在禁区外安全作业。“妇女与社会性别”在中国特色的背景中成为边缘的安全地带,其边缘性并没有构成对中心霸权的冲击。四、女权主义学术的边缘地位和女性学者在学界的边缘性相辅相成。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女学者的边缘地位突出表现在资源的贫乏。这使得争取外来资助来发展学科成为必要。但在今日金钱和权力等同的社会文化中,大笔的项目资金也会转化为权力而对人产生腐蚀。美国普通人都熟知的格言“权力腐蚀人,绝对权力绝对腐蚀人”看来对任何人都适用。这是中国女权主义者争取学术发展资源时面对的两难境地。概括地说,中国女权主义学术推进的努力是“逆水行舟”,异常艰难。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我不愿随波逐流,所剩的选择也只有激流勇进了。欣慰的是,我并不孤独。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个坚守相同信念的人在不同的角落勇敢地开拓着。这个信念就是:历史并不因为资本主义全球化而终结;历史是历史行动者博弈的结果。我依然期冀更多的青年学子加入行动的行列,在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实现一个独立自主有尊严的人生。在过去10年中,我已经看到了许多青年学者在学习女权主义学术过程中的成长。归根结底,是这些青年学者的成长正在把我的梦想转变为现实。

作于2010年夏